

从误读走向理解

——百年中国普希金研究回眸

□ 张铁夫

20世纪是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开始全面接触、剧烈碰撞的世纪。随着《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和其他林译小说的一部部问世,在国人面前逐渐展现出一个世界文学的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①。普希金作品的翻译始于1903年,与林译小说几乎是同步的。这一年也是普希金研究的开端,迄今它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

乐黛云先生说:“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当两种文化接触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误读。所谓误读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一般说来,人们只能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去认识这个世界!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的‘不见’和‘洞见’,决定了他将对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②在跨文化研究中,这种误读是普遍存在的。百年中国普希金研究就是一个误读和反复误读的过程,也是一个从误读走向对话、走向理解的过程。

从普希金“初临中土”的1903年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普希金在中国的身份是多重的,不断变换的,每一个时期被突出一种身份,而且这种身份往往被视为他的总体特征。他的第一部汉译作品是戛翼翠于1903年翻译的《俄国情史》(即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他的汉译作品均为小说。这

^① 钱仲书:《林纾的翻译》,见《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第269页。

^② 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见乐黛云、勒·比松主编《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10页。

就是说,他最初是以小说家的身份来到中国的。诚然,作为俄罗斯新文学的奠基者,“他立下文学创作一切(样式)形式的典范——戏剧、小说、诗歌、童话、十四行体诗等等”^①,但是他首先而且主要是作为诗人享誉文坛的,曾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他现存的第一首诗《致娜塔丽娅》(1813)比他的第一篇小说《彼得大帝黑人》(1827)要早十四年,而比《上尉的女儿》(1836)则早二十三年。但在中国,他的第一篇汉译小说《俄国情史》比他的第一首汉译诗歌《致诗人》(1927,孙依我译)要早二十四年,创作顺序恰好被颠倒了。这与20世纪初期我国对小说的提倡和对普希金的片面认识是分不开的。

普希金的第二个身份是革命诗人。从1920年代后期起,普希金的诗歌被陆续译成中文。这正是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时期。他的诗歌,特别是那些反对专制、歌颂自由的诗篇,在读者的眼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评论家和读者的心目中,他俨然成了一位革命诗人。到了1950年代,普希金更是被英雄化和偶像化了。^②

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乎整个外国文学都被否定。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被认为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独霸世界的野心”;启蒙学派被打成“蒙蔽学派”;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成了“维护剥削阶级制度”的文学;西方现代文学则是“反动”、“颓废”的文学。总之,对这些“古的和洋的艺术”,应该“彻底决裂”,“彻底批判”,“彻底扫荡”。这样,普希金的身份就成了反映“剥削阶级的政治愿望和思想感情”的“死人”、“洋人”,自然也在扫荡之列!上海的普希金铜像被砸毁,象征着这位作家在中国被彻底打倒了。

瓦尔特·F·法伊特说:“在跨文化关系的研究中,作为达成理解的必要条件,应着手确立误解在意义的理解中的功能。”他认为,“误解是打破‘无联系’(non-communication)的第一步”,“误解也以误解他者的方式打开了对话之门”^③。我国的普希金研究就是如此。正是戛翼翠翻译的《俄国情史》打破了我国与普希金乃至与整个俄国文学的“无联系”,开启了与普希金乃至与整个俄国文学的对话之门。到1920年代中期,普希金的小说《彼得大帝黑人》、《杜布罗夫斯基》、《基尔沙里》、《戈留欣诺村的历史》以及《别尔金小说集》中的全部作品都译成了中文,

^①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缪灵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80页注。

^② 关于普希金先后被误读为小说家和革命诗人的情况及其原因,笔者在《普希金与中国》(岳麓书社,2000年版)一书中作了详细的阐述,请参阅该书第27—38页。

^③ 瓦尔特·F·法伊特:《误读作为文化间理解的条件》,见乐黛云、张辉主编《文化传播与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9、90、94页。

《上尉的女儿》还出现了第二个译本。与此同时,莱蒙托夫、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鲍尔汗、高尔基等作家的一些作品也被翻译过来。从1920年代后期到“文革”之前,普希金的各种类型的作品——诗歌、戏剧、童话、小说和诗体小说得到了较全面的介绍,而俄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则一浪高过一浪,在整个翻译文学中占有绝对优势。与此相适应,对普希金与俄国文学的评论也十分活跃,在外国文学的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然,误解虽然打破了“无联系”的局面,开启了对话之门,但正如前面所说,一个误解消除之后,新的误解又出现了。对普希金的真正的理解,与普希金的全面对话,还是近二十多年的事。改革、开放的环境为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种真正的理解、全面的对话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普希金作品翻译的系统化

“文革”以前,普希金各类作品虽然翻译了不少,但主要是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现的,影响较大的有罗果夫主编、戈宝权负责编辑的《普希金文集》,吕荧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查良铮译的《普希金抒情诗集》、《普希金抒情诗二集》、《欧根·奥涅金》,孙用译的《上尉的女儿》等。1990年代,普希金作品的翻译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出版了两部四卷集——戈宝权、王守仁主编的《普希金抒情诗全集》和刘洪秋主编的《普希金文集》,还有四部大型文集——卢永选编的七卷集《普希金文集》、肖马和吴迪主编的八卷集《普希金全集》、冯春翻译的十卷集《普希金文集》和刘文飞主编的十卷集《普希金全集》。系统化的翻译本身就是与普希金的全面对话,它也为对普希金的真正理解打下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二、普希金评论的深广化

前面谈到,“文革”前对普希金的评论有不少误读,存在单一化的倾向。近二十多年来,这种状况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普评在广度和深度上有很大的突破,从一元化逐渐走向多元化。

1. 在思想研究中,“黑暗”与“光明”并重。从1980年代起,过去那种只讲“光明”、不讲“黑暗”,把普希金英雄化、偶像化的研究格局被打破。人们在肯定普希金追求自由、反对专制暴政的同时,对他政治上的沙文主义、思想上的贵族习气、私生活上的泛爱主义进行了适当的批判。此外,对他的宗教信仰和作品中的宗教精神,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而不再把他视为纯粹的无神论者。总之,人们较全面地分析了他的爱国主义与沙文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真挚的爱情与泛

爱主义、无神论思想和宗教情结的矛盾,让诗人走下神坛,使读者走近诗人。

2. 在创作研究中,艺术与思想并重。过去,对普希金创作的评论,侧重于思想意义的阐述,强调他的诗歌是“自由的警钟”、“革命的利剑”、“时代的回响”、“战士的心声”;即使是形象分析,也多为思想分析,如对奥涅金是否多余人,就曾进行过旷日持久的争论。从1980年代中后期起,对普希金创作的艺术分析明显加强了。学者们撰文分析了普氏作品的美感情态、深层意境、语言特色、修辞手法、文体结构、叙事技巧、象征意蕴、空白艺术、奥涅金诗节等,有的学者还把普氏的创作作为一个艺术系统加以探讨。这一切使普氏创作的艺术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揭示。

3. 在研究方法中,比较研究与本体研究并重。过去,普氏研究中存在着就普氏谈普氏的倾向,研究的视野较窄。近二十多年来,随着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复兴,学者们在普希金研究中的比较意识逐渐增强,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译介学研究 and 跨学科研究等方法,对普氏的创作进行多角度的阐述。近年来,文化研究也介入了普氏研究,如查晓燕对普氏国家观、历史观、贵族观的分析,任光宣对普氏宗教观的分析,以及其他学者对普氏自由观、伦理观、死亡观、女性观等方面的分析;高莽和陈训明还将行迹考察与文本研究结合起来;刘文飞和林精华等对俄罗斯和西方的普希金研究作了介绍。这一切拓宽了研究的视野,建立了研究的新模式。

4. 在研究成果中,著作与论文并重。前七十多年,普评的成果主要为论文,至于著作,则只有麦青编著的《普式庚》等两三本小册子。近二十多年来,论文仍是普评成果的主要形式,但著作的数量已增加到二十余种。较重要的有戈宝权等的著作,易漱泉、王远泽编《普希金创作评论集》,王智量著《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吴晓都著《俄罗斯诗神——普希金的诗歌》,陈训明著《普希金抒情诗中的女性》,孙绳武、卢永福主编《普希金与我》,查晓燕著《普希金——俄罗斯精神文化的象征》,高莽著《圣山行:寻找诗人普希金的足迹》,刘文飞著《阅读普希金》,以及笔者主著(主编)的“普希金研究三部曲”。上述著作是我国普评中的主要成果,对推动我国的普希金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里,笔者想借此机会谈谈自己在研究中的一些体会。

“普希金研究三部曲”的第一部《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1997年初版,2004年修订版)是针对我国综合性研究著作的缺失而撰写的。全书共12章,38万字。它以普氏的生平和思想发展为经线,全方位地对普氏作了评述,侧重对各种体裁的作品进行分析,阐明普氏在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前11章分时期

探讨了普氏的抒情诗、叙事诗、诗体悲剧、诗体小说、散文体小说和文学评论,第12章“普希金研究述评”论述了俄苏普希金学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普氏在国外被接受的情况。在一些理论问题上,如普希金与密茨凯维奇、尼古拉一世和莎士比亚的关系,本书提出了与苏联学者不同的看法;而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民族意识、时代意识和人类意识,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三部曲”的第二部《普希金与中国》是一部集体著作。全书共6章,34万字。它较全面地透视了普希金学在中国的萌芽、形成、发展、滞缓和复兴的历史过程,剖析了“普希金与中国”这一课题所包含的三个层面:① 普希金对中国的兴趣、认识和描绘;② 普希金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③ 普希金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书中介绍了五代翻译家、出版家和研究家。它是国际普希金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研究普希金作品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发展与延伸,不仅可以折射出中国社会心理的变迁和中国新文学的特征,而且也能从中比照出俄罗斯文化与文学的特色,从而成为研究中俄文化与文学的重要参照系。它既具有文学史的性质,又具有比较文学的性质。“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普希金新论——文化视域中的俄罗斯诗圣》是前两部著作的延伸和深化。全书共7章,28.6万字。第1、2章侧重论述普希金的思想(文学人民性思想和自由理念),后5章则从死亡意识、伦理指向、女性观念、圣经情结、叙事艺术等方面,对普氏的创作重新进行解读。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学理性问题,它们涉及普氏的文艺思想、自由理念、审美形式和诗学观念,由以前的生平、创作过程的定性研究,发展到专门问题的分析、把握和文化精神的透视。

三、普希金研究队伍的壮大和体制化

学科建设与队伍建设是密切相关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科建设主要是队伍建设。“文革”以后,高校的外国文学课得到恢复,而普希金及其创作是这门课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北京大学、湘潭大学等校还为本科生或研究生开设了“普希金研究”专题课。到目前为止,有三人以普希金为题撰写博士论文,他们是北京大学的查晓燕(《普希金——俄罗斯精神文化的象征》)、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白文昌(《普希金与俄国小说的发展》)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赵红(《〈叶甫盖尼·奥涅金〉汉译本的结构分析法研究》)。以普希金为题撰写学位论文并已获得硕士学位的有湘潭大学研究生沈云霞、宋德发、邓建中、周颖、王妍慧、朱洪文、巢进文,论文分别为:《普希金自由思想论》、《普希金的叙事伦理》、《普希金的死亡意识》、《普希金的女性观念》、《普希金的圣经情结》、《普希金叙事文学的叙述学研究》、《普

希金笔下的帝王形象》;正在撰写的学位论文有汤林峰的《普希金早期创作中的酒神精神》、杜艳丽的《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普希金童话诗》和杜敏的《〈黑桃皇后〉与19世纪初期俄罗斯社会转型》。随着翻译、研究和出版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后备人才的不断充实,普希金研究队伍的体制化提到了日程上。1996年5月,中国“普希金研究会”在北京大学宣告成立,李明滨教授被推选为会长。李毓榛教授在开幕词中谈到研究会的宗旨时说:“我们成立普希金研究会作为全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会的下属机构来总结一世纪来我国对普希金的研究成果和教学活动,推动普希金的研究工作,并同世界各国的普希金研究家进行文化交流。”^①在研究会的组织或参与下,1998年6月和1999年4月,先后在北京大学召开了“普希金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和“纪念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学术研讨会”,1999年4月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与巨人对话——纪念歌德、巴尔扎克、普希金、海明威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会议既是对普希金研究队伍的检阅,也是普希金研究队伍的重组。进入新世纪以来,这支队伍依然活跃在我国的普希金研究领域。

应该指出,在人们试图对普希金作出真正的理解和与之进行全面的对话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杂音,或曰新的误读。上世纪末普希金又获得了另一个身份——“19世纪俄国的唐璜”。1999年6月,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之际,珠海出版社和海南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一本名为《普希金秘密日记》的书。海南版在扉页上还印有“普希金诞生二百周年纪念(1799—1999)”字样。珠海版中译本序的标题为《真伪难辨的〈普希金秘密日记〉》,对该书的真伪多少有所怀疑,但该书的内容提要却又用肯定的语气说,“他在死后留下了一部用密码写成的秘密日记,后来被发现,并于二十多年前被偷运出苏联”,而且强调指出:“日记中记载的这些令人惊愕的事件与反思,揭示出普希金一生中未为人知的细节——它们描述了19世纪‘俄国的唐璜’的生活。”^②海南版则直截了当地称该书为普希金的“性史告白”和“性自传”,说它“以近似女阴崇拜的思路,将交合视为极乐之天。普希金以此整体全貌示人,自言因日记中所述种种罪孽、错误及身心折磨,与他的其余鸿篇杰作同属他传世总体的要素,不可以独没世而不彰”。^③诚然,普希金曾经自比唐璜,他的爱情生活也的确存在阴暗的一面,但《普希金秘密日记》一书却是如此污秽不堪,令人无法卒读。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严肃的学者的批评和指责。俄罗斯著名学者德米特里·利哈乔夫在《我们的职责是捍卫普希金》一文中认为,《普

① 见张冰:《中国普希金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成立》,《俄罗斯文艺》1996年第4期。

② 见《普希金秘密日记》扉页后“内容提要”,秦艳译,珠海出版社,1999年。

③ 见《普希金秘密日记》封底“内容提要”,彭淮栋译,海南出版社,1999年。

希金秘密日记》之类的书是假冒劣作^①，我国学者余一中和陈训明也分别撰写题为《作者死了，可以为所欲为了……——〈普希金秘密日记〉是一本伪书》和《话说〈普希金秘密日记〉》的长篇文章，认为该书是“伪书”和“赝品”^②。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刘文飞先生所写的《西尼亚夫斯基：〈与普希金散步〉》一文。该文较详细地介绍了西尼亚夫斯基的《与普希金散步》一书。在引用了该书关于普希金“轻浮”的一些言论之后，刘先生立即指出，“西尼亚夫斯基的这些话有些耸人听闻，哗众取宠”；在文章的末尾，刘先生又说，“西尼亚夫斯基对普希金的诸多言论是过于出格了，诸多结论也是站不住脚的”^③。这种用批判的眼光读书的态度才是一种真正的科学态度。

随着 20 世纪的逝去，中国普希金研究的第一个百年已成为历史。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的普希金学已初步形成，并已融入世界的普希金学。今后，我们必须不断培养研究的人才，拓宽研究的视野，扩大研究的层面，开辟新的学术生长点，使中国的普希金学与世界普希金学同步发展，共同繁荣。

① 见 2000 年 2 月 15 日《文艺报》。

② 见《俄罗斯文艺》，2000 年第 2 期。

③ 刘文飞：《西尼亚夫斯基：〈与普希金散步〉》，见《阅读普希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44、155 页。